

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几点思考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阐述了作者对开展术语教育所做的思考, 其中包括: 术语教育的定义; 什么是术语意识; 为什么要进行术语教育; 怎样开展术语教育等。这些都是着手开展术语教育之前必须首先给予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 术语学; 术语教育; 术语意识

中图分类号: H083

文献标识码: A

提高全明的科学文化素养是创建和谐社会这一总体奋斗目标下的重要任务之一。开展术语教育应该视为提高全民整体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个必要措施。几年前, 一个由中国科学院某副院长率领的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曾赴欧洲专门考察术语建设问题。归来之后, 提出的 6 条工作建议中, 第一条便是: “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 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 (e—learning) 的网络体系。”其实, 围绕术语教育有许多值得仔细研究的课题。本文写下的只是笔者个人的几点粗浅的思考, 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 什么是术语教育? 目前也许还没有人给它下过明确的定义。至少在我们国家, 这还是一个令人感到很生疏的概念。但是, 既然要倡导开展术语教育活动, 就必须对这个问题给予回答。我个人认为, 是否可以暂时给它下这样一个定义, 即术语教育是以术语学基本理论为依据, 以具备某一专业背景知识的高等学校学生及社会有关行业人员为基本对象, 以培养术语意识为中心目标的、普及性的教学培训活动。

对这个定义可以做如下几点补充说明。

首先, 开展术语教育必须要有科学依据。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种依据的首先是术语学理论。术语学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才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 到 60 年代末, 国际上已开始倾向把它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 也都要与术语打交道, 包括整理、规范本学科的术语, 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也都可能感受到术语对本学科学术交流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但是, 只有术语学才能从理论层次上对各学科术语的本质特征与一般属性作出更为深刻的阐释。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 术语教育才算有了根。在术语学产生之前, 是不可能提出什么术语教育的。因此, 术语学理论应该成为开展术语教育的依据与出发点。

其次, 还要明确术语教育的对象。接受术语教育的人, 应该是具有某一专业背景知识的人。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 是接受术语教育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人, 对术语可能会一无所知, 毫无感受, 术语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在校学习的大学生, 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 是已经初步掌握了本专业基础知识的人, 他们还可能成为未来本专业领域

内的中坚力量。对他们实施术语教育，一方面会对他们目前学好本专业知识，至少在宏观认识与方法论方面，提供有益的帮助；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说，也会对本学科领域内未来的术语建设，乃至整个国家与民族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他们应该是术语教育的首要对象。

所谓“社会有关行业”是指其工作直接或间接与术语关系密切的行业，如编辑出版、大众媒体、信息检索服务、语料库建设、科技翻译等。他们的术语意识与工作水平，往往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术语使用规范化的实施效果。对他们推行术语教育，既是目前大力提倡的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内容，也可以说是对此前术语教育缺失的必要补课。

这样的术语教育是一种普及性的教学培训活动。普及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广泛性。教学活动与培训活动并提，即是说，它可以是相对固定的，例如在高校开设这样一门面向不同专业学生的共同课，也可以是不固定的，例如，不定期开办的、有一定针对性的短期培训班，或者远程教育的网络体系。

我们这里把术语学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有意排除在术语教育之外。没有术语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当然无法开展术语教育。但那是术语学科本身的建设问题，属于另一个话题。

应该称为“术语教育”还是“术语学”教育？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个人倾向于前者。理由主要在于，这是一个普及性的活动，说“术语教育”比说“术语学教育”可能更令人容易接受。其次，就活动的目的与内容而言，主要还是围绕术语应用中的问题展开的。我们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传播术语学的理论，而仅在于培养“术语意识”（难道说成是“术语学意识”？），虽然我们的理论依据无疑是术语学理论。这就如同法制教育或健康教育，依据的理论可能是法学或医学，但并不说“法学教育”或“医学教育”是同样的理由。

第二，什么是术语意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从两篇见于报端的文章说起。《光明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不要‘难倒’经济学家”的评论文章。大意是说，每逢“两会”期间，大批记者总是带着各种有关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向著名的经济学家采访提问，但这种交流有时并不是那么顺畅。比如记者问经济学家，“我国是否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周期？”面对这样的提问，经济学家会被“难倒”而无法回答。如评论的作者所说，“增长周期”这种说法，似乎意味着，经济总是按一定“周期”出现增长。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更有违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学家只能发出“记者同志太年轻”这样意味深长的感叹。另一个例子是沈国舫院士提出的关于“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当的问题。据沈文透露，黄秉维院士当初在一次会上最早采用“生态环境建设”这一说法，随后他马上意识到这种说法有不妥之处。沈院士还特别提到，在国际专业交流场合，“生态环境建设”（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ilding）这一表述引起了国外学者的疑惑与不解，虽然几经解释，但仍无法被人接受。

可以想见，使用“增长周期”这一词语的那位记者肯定不是学经济学的出身。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记者对采访涉及的相关问题行行精通。但是，在与经济学家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应该尽量使用经济学的语言呢？即使一时无法掌握专业语言，至少不要生造“增长周期”这种貌似专业语言的词语。否则，他便是完全没有术语意识或缺乏术语意识。导致的结果自然是：无法达到正常交流的目的。

相反，从黄院士事后立刻觉得“生态环境建设”这一说法不妥，到沈院士在这一说法已经相当流行开来以后还一定要郑重指出其不妥之处，并提出补救性的处理办法，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术语意识。他们对牵涉到专业问题的语言表述是那么敏感，那么严谨，反复审视推敲，字斟句酌，可谓慎之又慎。这背后起作用的因素，即是术语意识。

上述两个实例，分别从正反方面显示了有无术语意识的不同表现。简要说来，术语意识

是指基于对术语的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而产生的严谨、科学地对待本专业技术术语，小心慎重地对待其他专业技术术语的一种学术自觉性。对术语的性质与作用是否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决定是否具有术语意识的关键。对任何个人来说，对本专业的术语与非本专业的术语，熟悉程度肯定是有区别的。对待所从事的本专业技术术语，应该力求做到严谨、科学。面对自己所不熟悉非本专业技术术语，至少也要有一种小心、谨慎、甚至敬畏心理——知道其中大有学问所在，而自己作为门外汉却不甚了然，因此在“狭路相逢”时必须非常谨小慎微，严肃认真，容不得半点随意性，知道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问题。说到底，是否具有术语意识，可能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科学文化素养的高低。如果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都有这样的术语意识，那对个人业务水平的提高，以至整个社会术语规范化的推进，肯定都会大有帮助。

第三，究竟为什么需要开展术语教育？这也许应该从术语的本质特征与功能说起。这本身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题目。我们这里只能简要地加以阐述。

科学与语言实际上是并行发展的。但是，在术语学产生之前，两者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被人忽视了。各个学科的专家，大多把语言当作是现成的工具拿来使用。传统的语言学并不关心这个问题，科学史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兴趣。20世纪初欧洲哲学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实际上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此影响下后来产生的术语学研究则明确地提出，科学越“科学”，语言在其中的分量就越重。这里所说的语言，当然首先指的是科学语言，或称专业语言

（LSP—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仍是术语学毫不含糊地指出，实际上，要掌握一门专业，首先必须掌握该专业的语言。为了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相区别，术语学把它称为“次语言”（sublanguage）。而术语无疑是专业语言的核心组成部分。什么是术语？语言学家、哲学家、术语学家都侧重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提出不同的定义。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大家都认为，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属于某一专业领域的、严格的科学概念。术语不过是指称这个概念的符号。而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的，它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没有概念，也就无法进行思维活动。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一个日常的、甚至是熟视无睹的现象，比如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到把它看作是某一个专业领域内值得研究的问题，到给它下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并给它一个固定的称谓，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也许是反复的认识过程。但一旦有了这个概念与定义，人们就可以借助它来进行进一步的思维活动，才可能进行判断与推理，最终提出各种科学的理论来。人类的各个学科的知识都是这样借助一个个术语，一点点、一步步积累发展起来的。因此，术语学著述上常说，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没有术语就没有理论。这绝不是什么耸人听闻或哗众取宠之语。仔细深入地理解这句话，就更能体会术语在人的认知活动与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发展极为活跃的认知术语学认为，术语还是折射人类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没有术语的思维，只能去借助日常的普通词汇，反映对事物的表象认识，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原始思维类型的特点。而科学型的思维，必须借助准确的概念与定义手段以及严格的术语系统，才能得以进行。

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到了目前这一发展阶段，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创新当然要求具备许多条件。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科学史上有许多创新都是先从质疑原有的概念、定义，到进一步突破、修正这个概念定义开始的。就这一点而言，有了术语意识，也会促发创新意识。

启功先生在论及“典故的性质”时说：“把一件复杂的故事，或一项详细的理论，举出来说明问题时，不可能从头至尾重述一遍；况且所举的，必是彼此共晓的故事或理论，只须选取一个侧面、一个特点，或给它概括地命个名称。凡能成为对方了解的信号，唤起对方联想的，都可以采用。所以无论剪裁、压缩、简化、命名，任何办法，都是要把那件事物，作为一个小集成电路，放在对方的脑子里去。”（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9，97页）。这

段叙述不少地方也可以用到术语身上。我们可以借用启功先生的比喻，把术语也看成是集成电路。作为学科的元语言，它也像集成电路一样，同样具有“体积小”、稳定性高等优点。如果没有术语，没有术语背后的概念与定义，也就等于没有了世代同业人士事先的约定，事事都得“从头至尾重述一遍”，试想，那样科学还能向前发展吗？

既然，对术语的性质与作用是否有一定的认识，是决定是否具有术语意识的关键，而只有术语学才会从理论层次上阐释术语的性质与作用，术语学又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即说，它有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有的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而这些绝不是其他学科可以替代的，更不是不经意间顺便就可以学到的，那么，有计划地开展术语教育，有目的地培养术语意识，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

然而，在从术语的性质与功能出发，从正面论证术语教育的必要性的同时，不能不指出，术语还具有一些“负面”的特征。笔者权且把它称为“隐性”、“软性”与边缘性。这些特征对认识术语及其作用多少起到了一些妨碍作用，对认识开展术语教育的意义也是一些不利的因素。

作为一种符号的术语，与一般的普通词汇相比，它的所指与能指之间，中间有更多的“隔层”。首先是专业造成的隔层；其次是定义即所指所包含的诸多复杂特征与术语即能指所选择的有限的命名理据造成的隔层。术语具有社会约定性，不可能望文生义。要弄清术语的真正意义，先要进入相关的专业，然后看这个术语所传达的概念；要了解这个概念，还必须看它的科学定义。总之，术语的实际所指被许多隔层包围、阻隔起来了。如果说术语处在表层，那么，它所指称的定义则处在深层，而且并不总是每有涉及，必然从头交代的。这就是所谓“隐性”特征。与此相关，一些本来应该是硬性的使用条件，由于隐性的作用却可能变成“软性”的了。有违这些条件的说法似乎也能“说得过去”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本属同一学科或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他们为某一个学术问题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最后发现，两人所用的某些术语背后的定义是不一致的，结果使得一场“高雅”的讨论几乎变成为一种无谓的争执。这也许就与术语本身的隐性与软性有关。而语言本来就具有的模糊性更为此起到了助长与掩饰作用。“隐性”与“软性”特征，也造成了术语研究的边缘性特征。虽然，术语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对某一学科术语的专门研究永远不会成为该学科学术发展的主流，也不大可能成为攻坚的课题，更不可能成为一门“显学”，它只能悄然地处于学科的边缘。然而，它对学科全面发展的支撑与制约作用，却是一个“硬道理”，绝不会因为身处边缘而削弱。认识了术语的上述“负面”特征，只会使为术语教育发出呐喊的人更加努力，更加具有耐心与韧性。他们永远也不要指望会获得一呼百应的效果。

如果站在术语学理论研究的高度来观察我们的社会生活，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与术语学相关的实例。例如，出于对病人的人文关怀，有人建议，应该把那些可能引起患者恐惧心理的可怕病名，如“红斑狼疮”之类，一律改名。同样，出于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有人主张对外翻译“航天员”一定要用“taikongnaut”。（直到今天，媒体上对“航天员”与“宇航员”的使用仍是混乱的。）与此相似，出于某种实用的目的，就考虑给一个地名更名，而全然想不到这会导致浓重宝贵的文化与历史记忆的消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谁都不会去责怪这些人。这些想法也都出自好意，但是，从术语学理论高度来说，上述出发点都未必是能站得住脚的命名依据。更值得指出的是，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当中还存在什么科学性问题，更不知道甚至想不到还有与此相关的专门学科。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开展术语教育是适应当前某些社会发展需要的。

阐述人类语言学原理的《比亚韦斯托克宣言》说：“现有的研究结果中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认识过程的加快实质上取决于专业词汇的发展水平。因此，各国的人士与政府应该清楚地懂得，他们致力于加快本民族专业词汇的发展，也就是在为本国的科学、工业与文化

进步创造条件。”¹这段话最好地说明了术语学研究以及术语工作的重大意义，它同样也可以用来论证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开展术语教育，让更多的人认识术语的性质，具有一定的术语意识，从而更自觉地掌握本专业的术语，遵守术语规范，同样是在“致力于加快本民族专业词汇的发展，也就是在为本国的科学、工业与文化进步创造条件。”

第四，2005年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上，与会者就我国的术语学建设步骤取得了共识。我们应该首先致力于引进国外的术语学理论，同时，努力将它们与汉语的术语实际相结合，逐步建立面向汉语的术语学。自打那次会议以来，引进国外术语学理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如果我们把这比喻为“窃火”的行动，那么，开展术语教育就应该视为“播火”行动。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相辅相成的。有了火种，才有播火的“火源”。“窃火者”也最有可能同时成为“播火者”。这对开展术语教育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开展术语教育的“第一推动力”只能来自国家授权的、专门负责术语建设的领衔机构。术语教育涉及多学科，多方面，多部门，任何个人的呼吁与努力，都显得太微弱，也不大可能打开局面。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已经把术语教育立为研究项目，并着手为开展术语教育做准备。

术语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科学，它要求不同领域的专家做出共同的联合努力。谁最有可能率先开始这第一讲呢？我认为，也许以语言学为背景的学者有可能首先做这件事。术语学很长时间被看作应用语言学的组成部分。总的说来，语言学的知识背景可能更接近术语教育的主要内容。最早在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人也是一个出身于语言学领域的学者，这也许并非偶然。

如果我们暂时还不具备条件全面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我们不妨先从小范围做起。比如，为某些研究生开设术语学课程，以便取得经验，逐步推开。

接下来就是教什么的问题。为了准备培训教材，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引进国外有影响的术语学派的理论。虽然，他们的理论是以印欧语为基础，但是其基本理论原理对汉语也是适用的。其次，我们还应该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当前中国的情况是，术语学的知识可能分散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科学史等不同学科里。国外的术语学专著有的把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作为篇首语。可见，古老的中华文化中也包含着对术语学研究有益的思想，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国外的理论原则与我们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

至于如何开展术语教育活动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要区别对待。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专业背景及目前从事的实际工作的性质与需要来决定讲授的内容，但术语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共同的部分。

在目前情况下，尽快把这件事由上而下地推动起来，也许是当务之急。迈出这第一步之后，其他的问题，总会在实践过程中找到解决办法。

附注

1 Language and Culture. — Белосток, 2004.

Reflec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rminology Education

ZHENG Shu-p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author's personal reflection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rminology education. It is reflected on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inology education, what is terminology awareness? why do we implement terminology education and how do we develop it. These are the key questions that must be answered first before launching the terminology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words: terminology science; terminology education; terminology awareness

收稿日期: 2007-06-14

作者简介: 郑述谱（1940—）男，山东牟平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词汇学，词典学，术语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